



第十六號

要目

- 三中全會宣言與時局 程瑞霖
根絕赤禍案通過於三中全會 俞率平
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
因蘇俄黨案想到的一個問題
什麼是改進教育的根本問題
中國私立大學的前途
合作事業與政治運動
左與右(雜感)



政問週刊社出版
民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三中全會宣言與時局

程瑞霖

自綏遠抗戰及西安事變以後，時代的巨輪已展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便顯示着新的問題急須解決。綏遠抗戰雖然獲得勝利，但是抗戰仍在繼續之中，我們應有如何的國策以保持這種勝利。西安事變是我國社會內在矛盾的結晶，加上容共抗日的輕飄思想，演成爲反中央的行動。那就是封建式的個人集團勢力承受不了中央政府的鞭策，反而懷疑中央政府的虐待，便有意無意的接納容共抗日的謬論，想登高一呼，以推翻中央政府的統治，西安事變雖然失敗了，但是國人思想的龐雜，仍然如舊，中央爲着鞏固現在統一的基礎，預防將來破壞統一的陰謀，實有向國人確定思想，更新視線，指示遠大方針之必要。這一個問題更是進行統一工作的基本問題。應時代需要而舉行之三中全會對於上述最緊急之問題，均有具體之規定。此種規定悉見於三中全會之宣言。

宣言首揭對外方針。二中全會對外交決議有云：『對外決不容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領土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

最後之犧牲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三中全會之宣言，向國人明告二中全會閉會以後，對日方針本此進行，毫無隕越。對此一點，有極彰明之事實爲之根據。國人當能記憶重慶北海上海漢口各地連續而起之事件，中央始終抱持不損國家領土主權之原則，與日本相周旋，雖屢次瀕于決裂，仍不屈服，全世界輿論均驚奇中國政府之忽然能如此倔強，認爲日本對華恫嚇外交之第一次失效。三中全會宣言自謂最近過去之外交能言出行隨，誠非誇大。對於今後對外方針，則顯示三個原則，（一）不畏外（二）不排除外（三）不倚外。所謂不畏外，當以『抱定自衛決心』爲最確切之解釋。任何民族有爭生存之權利，畏外不足以謀生存，僅足以妨害生存，吾中華民族遇生存被危害，當以不偷生之精神，作自衛之抗戰。吾民族持此信念，對日本如此，對世界上任何強國亦如此。更申言之，三中全會之所謂不畏外，非欲他國之畏我，以成我之不畏外，蓋欲主張任何國家均應有不畏外之精神，任何國家均應以不畏外之信念謀生存，而不能以畏外之心理以自趨于滅亡。所謂不排外者，即謂我中華民族決不以友爲仇，決不視可解之仇爲

不可解之仇，亦決不反對昔日之仇爲我今日之友。中華民族無閉關自守，無世界隔絕之偏狹見解，中華民族亦無牢記鄰邦舊仇世世不忘之偏狹心理。世界上無無利害衝突之國家，衝突既過，怨毒應隨之消滅，若有衝突而必須牢記

欲圖報復，則任何國家在世界上不能得一友國。中國爲一積弱之國，昔日乘機以凌我之國家，其數至衆，若必一一圖報，吾中國必自處于孤立。吾中國絕不認昔日凌我之仇爲不可解，更希望一切國家改變本來面目，以平等互惠之原則，與中國化仇爲友。吾中國持此態度，對日本如是，對任何國家亦如是。所謂不倚外者，一方面蓋不欲使不排外之心理變爲倚外以圖生存，一方面蓋不欲他國誤解中國懷有以夷制夷之下策。中國無閉關自守之心，中國歡迎一切國家爲平等互惠之合作，但中國不欲倚賴任何國家以謀生存。合作與倚賴，不容混爲一談。中國不能以表面之合作，被任何國家脅迫利用以成爲附庸。同時中國認以夷制夷爲下策，其第一理由，即中國實力如不能作人家的幫手，中國不能空望人家誠意的來幫中國；第二個理由，即令人家肯幫中國，亦沒有白盡義務的；第三個理由，即以夷制夷而釀成大戰，結果必與中國不利，因爲弱國是無資格收漁人之利的，弱國在鵠蚌相爭時，不與鵠同亡，則必與

蚌同盡，或竟先鵠蚌而毀滅。上述三項原則——不畏外，不排外，不倚外之三原則，爲中國今後之外交方針，這是天經地義的恰當和平凡，這應該可以確定國人今後對於外交的觀念。

與外交方針同等重要的便是宣言中關於和平統一及根絕赤禍之決議。西安事變對於統一的局面，多少是一個反動。這種反動勢力包括封建式的個人集團及容共以謀統一以抗日的僥倖心理。三中全會針對時局決定以和平謀統一，但必須根絕赤禍以求真正之統一。所謂和平統一，蓋希望全國文武明瞭中央不欲故意排斥任何人，不欲預定何人爲反中央者，而但求全國文武於國難嚴重之日，發出良知，大澈大悟，認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服從中央，鞏固統一，以增強國家求自存的力量。中央不認爲今日之中國國民尚有只顧私利甘心破壞國家之統一者，中央不認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於公私利益偶有衝突彼此意見偶有扞隔時而不能接受政府義理之曉諭與勸告者。中央之所以有此主張者，蓋深信今日之中國人均有資格作現代中國人，故願與中國人以和平謀統一。至若只顧私利，不顧國家，以個人集團反抗政府，破壞統一，使敵人得乘機進逼者，此不得不認爲中國人，而只能呼之爲中國賊，中央雖愛和平，但不

能與中國賊講和平。故中央所揭橥之和平統一，係對中國人而言，非對中國賊而言。宣言之原文有云：

……故所謂停止內戰，乃謂在同一主義之下，意見之分歧，不取決於武力，而取決於商榷，非謂分裂國家分裂民族之舉動，亦可藉內戰之口號，以為掩蔽，而無忌憚以進行。

吾全國國民讀此文後，大家應格外感動，勉為中國人，慎勿走入中國賊之路，而猶希望中央束手無策以講和平。

為着真正的統一，中央不得不決定根絕赤禍，然而中央仍以寬大為懷，欲於可能範圍之中，對共產黨人講和平統一。中央不欲以除惡務盡之舊訓，阻共產黨人自新之路，所以在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內，提出四個原則，第一、必須取消紅軍，第二、必須取消蘇維埃之組織，第三、必須停止赤化宣傳，第四、必須放棄階級鬥爭的理論及工作。以其產黨人作亂十餘年，糜爛中國十數省，殺人數百萬，蕩析宇舍，殘破物質，更不計其數，以國法論，雖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中央為謀國家之統一，但責其改過自新，其他悉置不咎，共產黨對中央如此的寬大，應該是極願意接

受的。中央給共產黨以再作中國人的機會，共產黨如不乘此機會，仍回到中國的懷抱裏，那便是自暴自棄，中央政府是再沒有法子可以成全他們了。共產黨應該明白，這種寬大的機會，只有一次，恐怕沒有第二次。共產黨如真有愛國之心，應該立刻放棄共產主義及第三國際所命令的一切，不應該提出任何要求。共產黨人從共產黨裏退出來，他們便可有了他們失去了的一切，他們將有了國家，有了祖宗，有了家庭，有了朋友，有了中國人的人格。他們退出共產黨以後，中國人不會再把他們當作共產黨看待，而把他們當作去而復返的中國人看待。在這裏我還要聲明一句，中國人不反對共產黨的回到中國國家，但是中國人希望他們誠意的回來，不希望他們別懷鬼胎的回來，如果他們沒有誠意，他們還是以作共產黨為好。

總之根絕赤禍與和平統一並無衝突，為着和平，所以准許共產黨自新而寬其既往，為着真正統一，所以不許國內另有共產黨的組織和宣傳。和平統一，自有其真締，吾人對此不可誤解。中央對於和平統一，深具苦心，全國國民對之應特別擁護，以民意的制裁力量，使中國再沒有破壞和平毀滅統一的軍人與策士。

根絕赤禍案通過於三中全會

翁率平

消滅赤化，務絕根株，是本刊所堅決主張，已數數爲文論之。因爲無論在國內社會情形之下，在國際環境狀況之下，共產主義之不適於中國，應該爲稍有理智的人所一致首肯的。而過去中國共產黨之禍害民族國家，殘暴的程度，更是足以叫國人刻骨銘心的牢記着，原已無待乎再提醒國人，去排除共產主義，而再發表許多言論的。可是共產黨又是那麼的狡猾，在他們窮促無路，瞬歸消滅的時際，又變出別樣的花頭來了，所謂民族戰線等口號，又無非爲欺騙一部份青年的簡單頭腦，希冀遂他們分化國人的願望罷了。張學良一部份的軍隊，受了他們的蠱惑，便弄到逼他們的領袖，做出犯上作亂的罪惡，幾乎又把民族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自從西安事變以來，由他們作亂者的所謂八項主張，便引起許多無謂的紛擾，一部份愚蠢而不肯安分的民衆，幾乎又認爲是攘奪權利的大好時機，紛紛的妄生共共的念頭，在三中全會開會的當兒，竟有以爲會中有討論容共的可能。

一直到蔣委員長在大會中提出了西安事變的報告，大會又一致表決，對於叛亂者的主張，不予討論，這才使

許多亂徒感覺到，清明之世，奸邪有無處托足之苦。二十一日第六次大會中，又討論到，主席團提出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經決議通告。這個決議案中，臚列中國共產黨過去的罪惡，危害民族國家的經過，並指出與中國國民黨根本不能相容的原理，提到「鑒往思來，不容再誤。」然而仍舊期望共產黨徒之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爲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

對於共產黨徒的歸順，並確切說明最低限度之辦法。

第一、必須澈底取消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必須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第四、根本停止階級鬥爭。這四點，真是起碼的條件，因爲一個國家，決不能有二個獨立的軍隊，更不容有二個政治組織，在國民黨訓政時期，又決不容宣傳一種絕對相反的主義。而階級鬥爭，根本是一種「非社會」「不人道」，而可以說是「永亂」的禍害，更爲吾愛好和平的國人，所不能忍受。這些簡單的理論，務望共產黨徒能夠體認，而有切實的覺悟。凡是我們愛國民衆，對於同是炎黃子孫的共產黨徒

，原是無時無刻不期望他們的悔悟，而能和我們站到一條戰線上來，為民族前途謀出路的。可是在他們甘心做赤色帝國主義鷹犬的時候，我們惟有把他們與「奸人」同一看待，必須先除奸，而後可以講到禦侮。所以對於共產黨徒，必須做到務絕根株，才能講到一致抗敵。「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理論，已成頗撲不破的原則。我們在這裏，惟有以最大的誠意，向中國共產黨呼籲，希求他們革面洗心，覺悟遷善，先接受上面四個條件，來同我們共為中國良民。一致抗敵，這是一個起點。精誠團結，必須除去狡猾。

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

周憲文

最近在日本方面，因為廣田內閣的辭職，宇垣組閣的流產，林新內閣的成立，對於中國的政策，顯然有所轉變。十五日中央社東京來電：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林銳十郎首次在日本議會內所報告的外交政策「措辭頗值注意，蓋其與以前各外長所發表者不同，尤以廣田有田三原則，林氏隻字未提。」林氏僅稱：「在此時機，培植中日兩國友好情感及改善兩國關係，相互合作，以期實現東亞之安定，實為當務之急」，「故中日兩國應理解彼此之立場，不特政府應如此，即兩國人民亦應有較密切之接觸，以便中

告，請他們多多檢點自己的言行，不論是在臺上，或是在臺下，不要今天這樣，明天忽又那樣，叫人民格外狐疑，而至於無所適從。我很記得有幾位喊起「向左轉」口號的人物，常常是許多思想左傾的青年的屠殺者。這樣害人，又何苦來！又在這一次全會中，已把久不到職的中央宣傳部長，改換他人，我們希望中央這一個重要的機關，今後切實負起宣傳三民主義的理論，使共產主義者不能再施其技。

廿六年二月廿二日上海

底明瞭，故外交當局，應在此方面多所努力，林氏當即答稱：日本不欲侵略華北，且遇有此等機會時，得盡力消釋誤會。同樣的，林氏在議會內答復政友會議員植原氏的質問時亦說：『日本不特迭次表示其不侵犯中國，但俟有機會時，更將作此表示。』

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即林氏的新對華政策，一言以蔽之，是欲以堅強的態度，促中日合作的實現。在宇垣組閣，因受軍部的反對而致流產，改命林氏出任艱巨之時，國人目睹軍部勢力的囂張，回憶林氏過去的歷史，羣以為日本今後的對華政策，必趨強硬，迨見林氏在貴衆兩院所發表之『頗值注意的』對華政策，多少有點奇怪，於是乃謂：林氏之所謂中日合作，仍是日本支配中國的別名；而其所謂堅強的態度，猶言『不受支配者格殺勿論』；剝去外衣，出現原形，則所謂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正是變本加厲而已。

但就字面而論，既稱合作，理應平等，中國人對於日本，原無偏憎，作者曾一再言之：『目前中國人的目標，僅在抗日，即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是日本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不向中國侵略，則中國人就失了抗的目標，中日合作，毫無問題』；方今林氏新閣初成，以

力謀中日相互合作為日本對華政策的大轉變，吾人固不願作惡意的解釋，謂其將變本加厲，然就林氏的言論以觀，則對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自亦不能釋然無疑。林氏既稱日本不欲侵略華北，又謂遇有機會時，得盡力消釋誤會，但是華北走私的猖獗，各色浪人的橫行，特務機關的林立，以及冀東偽府的存在，凡此種種，都決不是可以消釋的誤會，而是鐵一般的事實。林氏更稱日本迭次表示不侵犯中國，但隨日本這迭次的表示，中國的領土，初失東三省，繼失熱河，現連察北與冀東亦已脫離中央政府，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決非『表示』可以掩飾。這是吾人對於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不能無疑者一。次則，種種事實，原非誤會，即退十萬步言，謂為誤會的結果，但日本尙可隨時『消解』，諸如華北走私的取締，各色浪人的管束，特務機關的撤退，冀東偽府的取消，祇要日本有此意思，隨時都可實行，而宣言『欲以堅決態度謀中日相互合作』之林氏，竟謂『俟有機會之時』。這是吾人對於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不能無疑者二。

最後，我們希望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轉變，不是變本加厲的別稱，但要我們釋然無疑，還有待於林氏之事實的表示上。願國人努力自強以觀其後。

因蘇俄黨案想到的一個問題

陳高儔

近年來蘇俄時有所謂黨案發生。蘇俄本爲世界上惹人注意的一個國家，平常的一切舉動都足以引動世人的注意與研究，於是所謂黨案亦便引起世人的各種談論了：大概同情史太林的人以爲蘇俄黨案之所以發生完全是由於托洛茨基派的人破壞蘇俄社會主義的建設的原故，而袒護托洛茨基派的人則以爲是史太林爲了權位之爭不惜用殘辣手段，消滅反對自己的敵人。因此對於蘇俄政府所宣布諸政治犯的罪狀，亦便有人信爲真實而有人則疑爲虛構了。我們看來，這兩種意見都不免是由於黨派的成見而來；固然人類的意見沒有絕對超然的，多少都不免有點黨派的成分或隱或顯的參雜其間；但是我們既非蘇俄國家的國民，又非史太林或托洛茨基的黨徒，對於蘇俄國家本身之事，無論如何，應當盡可能的用超然客觀的態度來評斷才好。我們畧用超然客觀的態度來看所謂蘇俄的黨案，可以這樣說：

1. 從人道主義上來看，蘇俄黨案固不論其誰是誰非，誰曲誰直，總是一種人類自相殘殺的現象。但是人類自相殘殺的事實是自古爲然，而即至今日，世界

各地亦還是如此。遠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近之如西班牙內戰何莫非人類自相殘殺的事實。而且各帝國主義目前猶正積極擴充軍備，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之自相殘殺，猶不知何日爲止。蘇俄人民當然亦是人類，而且是生於二十世紀的人類，既不是超人，亦不是將來的人，那末，即使所謂黨案是自相殘殺，那亦是此時人類通有現象中的一部份現象，當然無用我們驚奇。

2. 所謂黨案卽因政治意見不同而發生的鬥爭。目前世界各國都有其政治事業，都各有政黨組織，因政見之不同又沒有不發生政治鬥爭的現象。儘管鬥爭的手段或是激烈或是和緩，有所不同，然彼此傾軋，互相排斥之根本性質則固無大異。若然，到蘇俄之黨案亦屬近代國家通有現象中的一種事實，固非絕對例外之事。

3. 以蘇俄黨案本身的事實來看，政府之不惜用嚴厲手段對付多年努力革命事業之同志，固使人足以震驚，然而我們知道蘇俄目前正是埋頭建設，愛護名譽

之時，此種黨案對於蘇俄國家之建設是損是益，吾人姑且不論，然足以惹起外界對於蘇俄之許多誤解嘲諷，則為必然之事。所以若非萬不得已，恐蘇俄當局亦不見得冒然出此。但是所謂反政府派的諸巨頭，都是多年奔走革命的社會主義信徒，而且有幾位直可說是手創蘇俄的元老，因此不惟各報紙所載彼等勾結帝國主義顛覆蘇俄政體之事實，使人疑信參半，即彼等反政府當局之動機，亦恐非為了簡單個人之事。所以我們若以超然客觀的態度來看，祇能為蘇俄國家遭遇此種不幸事情惜，而殊難對任何方面作左右袒也。

以上三點意見，是我們盡可能的用超然客觀的態度對蘇俄黨案而發生的意見。然我們因此種事情却深深地感想到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了。因為人遇了問題，因為各人着眼之點不同，總有種種不同的思想發生。如遇了一件搶盜案件：警察所想的是如何捉得強盜，如何找得贓物，如何把強盜送到法庭。法官所想的則是誰是主犯，誰是從犯，他們的罪狀應用那一條法律來判決。社會學家所想的則是，社會上為甚麼有強盜發生，這個社會的強盜為甚麼比那個社會的強盜多，怎樣才可以絕滅強盜的發生。我們既不是蘇俄國民，又不是屬於蘇俄的任何黨派，於是我們因蘇

俄黨案而發生的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亦就是由事實本身而進於學理上的一個問題了，可說不是政論家所想的問題而是哲學家所想的問題了。

蘇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唯物史觀為理論中心，據唯物史觀的道理說，人類的一切意識與行為是以經濟為基礎，經濟基礎有階級劃分的時候，人類意識與行為自然要產生矛盾對立的現象，因而鬥爭衝突之事自不能免。所以要消滅人類的鬭爭，惟有先消滅經濟上的階級劃分，將來人類經濟上的階級完全消滅，則人與人間的生活自可永遠成為友誼互助的美滿生活了。蘇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完全實現的國家，然至少可說是已經走上社會主義之路了。蘇俄國內經濟上的階級劃分，雖然不能說是已經完全消滅，然據說已經是不至再如資本主義國家之階級對立了。況且黨案中的兩方人物又都是多年服膺社會主義的有名人物。從種種方面想來，蘇俄國家內部似不應再有若何矛盾鬭爭的事情，即有亦不應發生在所謂社會主義的領袖之間，即發生亦似乎不應再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鬭爭更兇。因為蘇俄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以來幾乎二十年頭。若說再有階級鬭爭，不惟蘇俄當局不願提，即吾人亦覺不好說也。但是假如不是階級鬥爭，難道

還能如中國以前史家所說的君子小人之爭嗎？或者亦還能如普通人說的意氣之爭嗎？因為這些說法都是唯心論的見解，在社會主義的理論中，當然是說不通的。這樣推論之下，便使我們真發生一個人生哲學的限本問題了，即人類的友誼互助社會究竟怎樣才可以實現，人類間的矛盾衝突，自相殘殺的事情，究竟是否可以完全消滅，如能消滅，究竟要到甚麼時候，究竟須從何處着手。

消滅人類間矛盾衝突，造成友誼互助的社會，這可說是自古以來思想家所同有的一個理想。以前唯心論的哲學家以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心理的表現，所以要想使人的行為合理，惟有先正人心，「一正心而國定」，祇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可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但是我們從歷史上看來，中國宋明理學最盛之時，亦即黨爭最烈之時，西洋宗教最盛之時，亦即戰爭最多之時。因此我們把唯心哲學家的學說與其影響研究之後，覺着按唯心論家所指的方法，理想的社會是不見得能夠實現，而唯物論

的說法，倒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但是在目前雖稱階級已經入於消滅之途的蘇俄，而竟然亦連續發生激烈的黨爭，這又不免使我們發生一種問題了。

記得去年在一個宴會上，大家談笑，周憲文先生隨便發一問題說：「社會主義實行以後，究竟是否永無戰爭？」大家覺着他問得很滑稽。但是此時我因蘇俄黨案而亦發生問題了，即經濟上的階級消滅之後，是否人類間的鈎心爭角之事可以永不發生。這個問題在飽學之人看來，或許亦是一種滑稽話，然我却很希望為我解答一下。

又記得有一次與一位朋友談到思想主義問題時，他說：「你不要太傻了！一切思想主義，都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不過拿到支票的人不知是不兌現的，所以望梅止渴，亦甚足以自慰。至多祇可說一筆長期存款，不能取本，祇能零星取息。」事情真是這樣嗎？但書呆子的心理是「打破沙鍋問到底」，我還是要請問高明，究竟人類間的衝突矛盾怎樣才可消滅？

什麼是改進教育的根本問題

杜佐周

教育的功能，可分為個人與社會兩方面來討論。在個人方面說，教育要使學生能夠做一個現代化的人。什麼知

識他應該充實，什麼習慣他應該養成，什麼技能他應該訓練，什麼興趣他應該培養，和什麼品格他應該備具等，都

當依照目下社會的實際需要，規定具體而合理的標準，以期求其實現。在社會方面說，因為有這些受過教育而具有充實的知識、優良的習慣、熟練的技能、高尚的興趣、和健全的品格的人，去推動各種社會活動，社會才會進步，而能充分表現其能率。就中國的現狀言，一切救亡圖存與復興民族的工作，都要依靠教育的力量來完成的。

後一種功能之能完成與否，當然要視前一種功能之能否表現為轉移。我們試看國內一般教育的實況，若以學生的知識是否充實、習慣是否優良、技能是否熟練、興趣是否高尚、與夫品格是否健全，來估計近年來實施教育的成績，我們不能不坦白的承認：其中十之六七是失敗的。這不能完全歸咎於學制的不良、經費的支絀、課程的失當、和方法的欠善；依我所見，其最重要的癥結，還是一般從事於教育者之「人的問題」。因為他們未能澈底明瞭教育的目的，及認識個己的責任，以身作則，實事求是，埋頭苦幹，以求實現教育的功能，故同樣性質的公民訓練、體格訓練、軍事訓練、職業訓練、和科學訓練等，在他國確能提高民族意識、鍛練健強體格、培養嚴密紀律、熟習生產技能、和充實科學知識，使學生能夠忍苦耐勞、明白是非、熱心公益、順從正義、運用科學、努力事業、成為真

正肯為社會國家服務的份子；而在我們，則就鮮有這種成效！

嚴格而言，一個學生受過相當的教育以後，若仍知識貧乏、習慣惡劣、技能粗拙，興趣低陋，則就是教育失敗的明證；但我認為其中最大的失敗，尚不在此，而在一般學生人格的低落。這種責任，社會環境應負其半；而學校內的教職員亦應負其半。現在社會環境的複雜，不是幾句話說得了的。社會方面的波瀾，往往衝進學校，使學生為之陷溺，莫能自擇，因而加深訓練上許多困難。辦學的人，亦往往因為受了外界的種種牽制，以致良好的計劃不能實行，嚴密的紀律無從建豎，結果，教員的教學或不免因此而敷衍，職員的任事或不免因此而鬆弛。其甚者，教員與教員間、職員與職員間、教員與職員間、教員與學生間、職員與學生間、學生與學生間、分立門戶，播弄是非；有利存焉，趨之若驚；利盡，則如鳥獸散。萬一有機可乘，其無恥之徒，且將本其爾取我奪之技倆，利誘學生，推波助浪，鼓動風潮！求其能以誠信相孚，道義相尚，各治其事，各盡其職，不以私害公，而能確為學生的表率者，誠不可多得。這樣，教育的功能安能表現，教育的事業安能獲得進步呢？國家年費數千萬元興辦教育，其結果如此

，豈不可嘆！

今後我們若欲救濟這種缺點，而使教育能夠切實表現其功能，則一方面固當擺除一切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和干涉，而要進一步求其合作與協助；另方面尤當嚴格選聘教職員，除注意其能指導學生在知識、習慣、技能、和興趣

各方面上獲得實際的進益外，更應考察其能否以人格感化學生，使其成為具有健全品格的個人。古人說：「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訛」，可知人格感化的力量，是非常偉大的。這就是我所謂「人的問題」，亦是我認為目下改進教育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中國私立大學的前途

朱有鑑

「民族之魂，是我們大學裏反映出來的」。這是英國學者霍而登（Haldane）在大學與國家生命（University and National Life）裏的一句話，尤其在今日，經濟政治組織的突變，早把教育作為他的工具，為民族生存的鬥爭，國家要把一切經濟的文化的乃至道德的、宗教的一切制度，都由政府統制起來，大學教育不能離開這條路，私立大學當然要遭受這樣的命運。

大學的一切措施亦比較令人滿意，增加經費，減輕學生担负，安定教職員生活，添置設備，一部份私立大學便相形見拙了。尤其是世界經濟恐慌在次殖民地的中國為尖銳化以後，中國私立大學的發展便無形受到重大的打劫。

中國私立大學，有三種人在經營。第一是資本家的財團，第二是宗教團體，第三是官僚政客或學者。資本家經營的大學極少，而且現在連資本家的本身都沒落了。資本家自顧不暇，那裏還能拿出錢來辦教育？（至於大學教育立、省立的，中國教育的發展，半靠着私人的努力，尤其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政治沒有上軌道，國立、省立的大學因受政治的影響不能安定，私立大學却虎虎有生氣，為國家造就人材，建設文化，在國家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蹟。但最近七八年來，中國政治有顯著的進步，國立

家經營的大學極少，而且現在連資本家的本身都沒落了。資本家自顧不暇，那裏還能拿出錢來辦教育？（至於大學教育立、省立的，中國教育的發展，半靠着私人的努力，尤其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政治沒有上軌道，國立、省立的大學因受政治的影響不能安定，私立大學却虎虎有生氣，為國家造就人材，建設文化，在國家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蹟。但最近七八年來，中國政治有顯著的進步，國立

本沒有多少錢，官僚政客大多數又沒有辦學的根本方針，到處抱着一種敷衍的態度，如此欲求發展，也就難上加難了！因此，私立大學本身的經費問題，大多數不能解決，祇好在學生身上設法了。因為如此，學生祇好濫收，職員祇好兼職，設備祇好從簡，很少有學術的空氣，品性的陶鑄，於是「師生視若路人，學校等於傳舍」，而離開「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的路便日遠一日，其實，這也不僅是私立大學的毛病，而成爲今日中國教育的通病了。

總之，私立大學的經濟機構，根本起了問題，而行政上，思想上還得受政府的統制，於是私立大學的前途便成了嚴重的問題，究竟大學不是私人的企業，私立大學在國家建設上有重大的貢獻，今後的生命，必待政府予以大量

的補助，嚴密的監督，一直到逐年變爲國立爲止。這次三中全會中委孫科于右任等提議津貼上海私立復旦大學，使國私立大學的問題，復旦是中國私立大學中成績卓著有歷史的學校，應該受政府的補助，但私立大學的補助究竟不是枝枝節節的問題，我希望秉政諸公，應該有更進一步的討論，來研究中國私立大學一般的問題，求得一個合理的解決。個人主張教育是國家的事業，不應由私人經營，中國的私立大學應逐漸予以補助，發展，糾正，而最後收歸國立。如果拿三百萬來辦一個新的大學，或一個獨立的學院，則反不如集中經費來補助有成績的私立大學，使他走上健全的道路，在民族的發展上盡最大的努力。否則，私立大學沒有前途，於國家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合 作 事 業 與 政 治 運 動

瞿今周

合作事業之先驅者羅虛戴爾氏，爲合作事業定下了幾個原則，其中有一個就是：「合作社對於政治及宗教應守中立」。這一條「政治中立」的原則，從事於合作運動的人，素來多奉爲圭臬，可以說是合作社常識的大憲章。但

是因着時勢之推移，歷史之演進，這個原則，已有再檢討之必要了。一九三〇年第十三屆合作社國際聯合大會席上，法國代表即提出關於合作事業與政治運動的議案，請大會組織特別委員會，調查羅虛戴爾原則在各國適用狀態。

當經大會決議通過。至一九三四年第十四屆大會開會時，該特別委員提出報告，對於羅虛戴爾氏政治中立原則之解釋及其適用之方法，皆有修正之說明，並主張合作社除在生產及分配之純經濟的領域中努力改革外，更須積極的向教育及政治方面邁進。蓋所謂政治者，乃謂治理衆人之事，合作事業之目的，既在改善人羣之生活，而生活並非限於純經濟的一面，還有屬於社會的，政治的許多事項，故合作事業不僅局限於單純的經濟改善運動，如由信用合作以流通金融，防止高利的盤剝，由運銷合作以調節供求，免除居間人之剝削，以及由生產合作或利用作合以改良技術，增加生產等事業，且應參加上層機構的政治活動。尤以我國人民在物質上窮苦衰弱，精神上愚陋渙散，外受帝國主義者侵略，內受封建惡勢力蹂躪之今日，合作事業一方面致力於經濟之改革，同時更向政治方面邁進；實為最迫切的要求。

我國之合作事業在「五四」運動以前，已具萌芽。孫中山先生於三民主義講演中，亦屢次提及合作與地方自治。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而後，以合作事業為實現民生主義之一種手段，對於合作事業之提倡，不遺餘力。十七年十月二十日第二屆中央常會議決：合作事業為七項運動之一，

同時設置合作事業設計委員會，制定計畫，訓練下級黨員，指導推行合作。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確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設基礎案，規定合作事業為自治機關之一主要職務。其後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及代表大會等皆有類似之提案。二十四年十月全國經濟委員會設置合作事業委員會，翌年三月，中央民衆訓練部，成立中央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並令各省市設立省市黨部合作事業委員會。此外，實業部有合作司，各省政府更各有合作事業之主管機關。最近國民政府林主席在紀念週席上講演，又諄諄以合作事業為言（見二月十五日各報）。綜上所述，足證我國當局者對於合作事業提倡之努力，惟其方式，並非合作社參加政治的活動，乃將合作事業作為政治工作之「而推動。中央民衆運動委員會合作社指導辦法第五項規定，黨部對於合作社之組織及業務，負宣傳倡導之責，並須設法扶助其發展。即是將合作事業作為黨務之一項目，然此規定，却將合作事業與政治工作打成一片。在此種情形之下，合作社既浸潤於政治之氛圍中，正「易於」且「適於」踏入政治的領域。更有進者，合作乃人民之自治團結的事業，「只管經濟，不問政治」，是「消極的」，由當局作為政治工作之一而推行，

是「被動的」。合作事業停滯於「消極的」或「被動的」境地，終不能有長足的發展，以之為實現民生主義之手段；更談不到。必須由單純的經濟改善擴充至於政治活動，始是「積極的」、「主動的」。中央民衆訓練部之所以設置中，中央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者，其主旨亦在使民衆能夠積極的，主動的參加政治活動；否則，合作事業對政治守中立或處於被動地位，與民衆訓練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故吾人就合作行政之本身論，對於合作事業與政治運動，須予以新的認識。

近閱合作前鋒創刊號陳仲明、唐巽澤兩先生之論文，對於合作事業與政治運動，有鮮明的主張。陳先生謂：「現階段中國合作運動的新意念，應當一變從來純經濟作用的一種所謂平凡平庸的運動而應包含創造新社會制度與建立地方自治健全單位的社會作用與政治作用」。唐先生從事於合作事業，親歷戎行多年，備嘗艱苦，由其實際經驗，深知經濟與政治中間的密切關係，從前合作運動者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處於超然的地位，因事實的試驗與教訓，已經失却其根據，漸漸行不通了。主張合作運動者應該

放棄狹隘的純經濟的立場，熱烈地號召合作大眾，擁護對外謀民族的解放，對內求大眾生活的改善兩大要求。將合作運動和政治運動合流，教育保甲公民訓練以及國民代表選舉等等，合作運動者應該儘量參加。一面充實合作運動的精神，造成合作運動本身的政治力量。同時更應取得政治上的援助；使合作運動者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消極的接受政府的援助，監督和指導；積極的去鞭策政府使之執行正確的合乎大眾需要的政策和路線。假如不此之圖，仍執着傳統的成見，硬將合作鎖閉在純經濟的圈子裏；合作運動就不能為大眾所同情，所了解，因而也就喪失了事業發展的前提。同時，陳仲明先生更提出了一個理由，謂目前中國有個特別的現象，就是紳董的存在。有許多事情政府與民衆要拿紳董作為媒介的。今後欲使民衆與政府直接發生關係，不被紳董居間操縱，惟有由合作機構發生政治作用。

綜上所述，無論由合作的本身着想；或由政治方面着想，合作事業與政治運動皆須「一元化」，這是新時代的呼聲，幸國人注意及之。

左與右（雜感）

周憲文

自從什麼右派、左派、右傾、左傾的名詞流行以後，左乎？右乎？就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大人先生們可左可右，時左時右，亦左亦右，左右逢源，得心印手。於是乎，熱血的青年，不是生了左傾的小兒病，就是患着右傾衰弱症，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這叫做左右爲難。大人先生們在「左右逢源」之下，官愈升愈高，財愈發愈多；「人得道，鷄犬升天」，左右利祿，自在其中。可是熱血的青年，因「左右爲難」而下獄喪命者，也就日增月盛，不知萬幾。「如此這般」，經驗告訴人們，我如沒有『左右逢源』的本領，碰到緊要關頭，就得『王顧左右而言他』，不着邊際，不作『左右袒』，至少也得『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此之謂『明哲保身』；算不得『老奸巨滑』。否則，必致『身勤而事左』，不能見諒於『豪右』也。

『左右逢源』，固然是大人先生們升官發財的本領，非『常人』所能妄想，但細按之，其間亦似有一定之『法則』存焉。大人先生們在野之日，言論『惟恐不左』，一旦上朝，則行動又『未有不右』；視『左傾』爲『左道』，『格殺勿論』，『左遷』『放逐』，其餘事也。故今日之主張抗敵者，一旦政權到手，是否真能抗敵，跡之過去事實，不能令人無疑。這些以『左右逢源』的本領爲『升官發財』的工具者，其言論，其行動，既另有目的，且姑置不論；但是『居心無他』的『各界領袖』，則不論在野在朝，或左或右，都應一言一動，負起責任；不言己不行之言，不行背己所言之行；出言不苟，躬行不悖；祇要真左真右，固屬左右無傷，而熱血青年亦不致於左右爲難；大人先生們縱有本領，恐亦必有左右碰壁的一日。

目 要 期 各 近 最 刊 本

第六十號

- | | |
|-------------|-----|
| 抗救論商榷 | 何炳松 |
| 中華民族的團結救國 | 顧頡剛 |
| 希望於三中全會者 | 薛伯康 |
| 批評與漫罵（續） | 朱偰 |
| 公墓問題 | 李守廉 |
| 論改造縣行政爲當務之急 | 劉培桂 |
| 「巍巍乎，我中華！」 | 易君左 |

第五十九號

- | | |
|---------------------------|-----|
| 批評與漫罵……… | 朱 僕 |
| 所謂中國人民陣線的真相及其
理論的檢討……… | 駱美奐 |
| 民族意力與愛國真誠……… | 劉百閔 |
| 林銑十郎及其紹闡……… | 休紀東 |
| 妨害統一的幾種口號……… | 汪寶瑄 |
| 德國的唯生論哲學……… | 趙紀彬 |
| 遊意雜感……… | 徐逸樵 |
| 容共之五不可……… | 徐慶譽 |
| 地主房主與貢獻一日所得運動…… | 朱 僕 |
| 明日中國的合作運動……… | 壽勉成 |
| 德意志的文化統制……… | 王文萱 |
| 非常時期的中國青年……… | 陸占亞 |
| 對於大學政治系的建議……… | 汪德裕 |
| 湘政見聞記(八)……… | 周 還 |

中 國 新 論 第 三 卷 第 三 期

日 本 評 諭

- | | |
|----------------|-----|
| 日本政治機構究缺乏的組織 | 雷震 |
| 我國最近教育行政之趨勢 | 馬宗榮 |
| 航究建設與國民經濟 | 潘樹藩 |
| 日德同盟之前因後果 | 胡鑄坊 |
| 日本之青年訓練 | 廖鸞揚 |
| 所謂華北經濟開發 | 王雨桐 |
| 維也納三國協定與小協商諸國 | 符彥 |
| 滿鐵改組與華北經濟的關係 | 朱家騏 |
| 九一八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收穫 | 姚紹華 |
| 提倡大眾副業 | 徐逸樵 |
| 成吉斯汗的參考書籍述畧 | 薛詮曾 |
| 蘇俄教育狀況 | 張公蔭 |
| Veltet 記行 | 侯紹文 |
| 南京下關靜海律寺調查記 | 徐益棠 |
| 黃大嫂的悲哀 | 洪樂平 |
| 作者介紹 | 編者 |
| 編後 | 編 |

- | | | |
|--------|--------------------------|-------------|
| 日本政潮紀要 | 日本前途與中日關係
與日本知識界論中日關係 | 林瓊光
高臨灘 |
| 軍部 | 政黨與財閥
新政一新之實蹟 | 鄭宏述
吳叔和 |
| 外交 | 對華外交 | 崔書琴 |
| 經濟 | 對華北之侵略
對東北之侵略 | 劉燕谷
林紀東 |
| 財政 | 外貿 | 周伊武
周伯棟 |
| 貿易 | 金融 | 瞿荊洲
武育幹 |
| 產業 | 國防 | 張覺人
袁釗 |
| 教育 | 社會 | 丁鶴予
夏孟輝 |
| 文藝 | 學術界 | 吳自強
姚寶溟若 |

民國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刊投稿簡則

(一) 本刊歡迎關於政治、外交、經濟、財政、教育、建設，各種討論批評實際問題之外稿（以短敘明暢為原則）。

(二) 投寄譯稿，須附原文，以資核對，稿末並須附具原書卷頁（最好能將原著者歷史作一極簡要之介紹）。

(三) 來稿務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四) 來稿須於姓名下加蓋圖章，書明通信地址。

(五) 來稿揭載後，酬本刊全年一份。

(六) 來稿概不退還，惟附有郵資預先聲明者例外。

(七) 來稿本刊有增刪修改之權，如不願增刪修改者

請先聲明。

(八) 來稿請直寄南京石鼓路一〇九號本社編輯部。

定 價 表		
郵 費	定 價	期 數
國 內 不 收	零 售 每 期 分	每 週 一 冊
澳 門	半 年 八 角	全 年 五 十 二 冊
國 外	全 年 一 元 五 角	
香 港	全 年 一 元 六 角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國民政府內政部警字第五二零五號
中央宣傳部文字第六一一號

政問週刊 第六十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編輯者 政問週刊社
發行所 雞鳴書屋

總批發處 電話二二六〇二

印刷者 中山印書館
地 位 南京國府西街
全面價目 陸元
半面價目 伍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封底外頁 拾元
及封面裏頁 一元
肆元
三元
二元
元

廣告價目表		
乙等	甲等	特等
正文前後	及封面裏頁	封底外頁
陸元	捌元	拾元
肆元	伍元	陸元
元	元	元
二元	三元	四元
元	元	元

意注
 (1)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2) 如用廣告圖畫，銅版鋅版工料費另加。
 (3) 長期連登者，可特別優待，訂期一月以上者，第一期概行送登。
 (4) 惠登廣告請向南京石鼓路政問週刊社接洽。

八八二三二：話電 號九〇一路鼓石京南：址地

中華民國廿六年二月二十四日